

《罪恶史——亲历者的证词》

作者：维克多·雨果

译者：简律纯

第一天 陷阱

安全

1851年12月1日，夏拉斯耸耸肩膀，卸下了手枪里的子弹。实际上，相信有可能发生政变，这已变得令人屈辱。关于路易·波拿巴先生可能非法使用暴力的假设，一经严肃审核，便渐渐自动消失。当前的大事显然是德温克选举；政府显然正专注于此事。至于谋害共和国和谋害人民的罪行，难道会有人蓄谋干这样的事情吗？哪里有做这等梦想的人物呢？要上演一出悲剧，就得有一名演员；显然，这里缺少这样的演员。违反法律、取消议会、废除宪法、扼杀共和、镇压全国、玷污国旗、屈辱军队、对神职和司法人员施暴、政变得逞、大获全胜、实行统治、予以治理、流放一批人、驱逐一些人、放逐、抄家、暗杀、当皇帝，加上另一些共谋性质的罪行，最终使法律变成类乎妓女床第那样的东西。什么呀！竟会干出所有这样一些荒唐的事情！由一位巨人来干吗？不！是一个侏儒！这会令人忍俊不禁。人们不再说：可怕的罪行！而会说：简直是一场闹剧！因为，人们终于思考起来。干坏事也得有气度。某些罪行的规格太高，凡夫俗子的双手没资格去干。要想干雾月十八日那样的事，过去就得有阿尔柯拉(1)，未来就应有奥斯特利茨大捷！当江湖大盗，并非随便哪个人都能干到的。人们在相互议论：“这霍尔滕斯之子是个什么东西？他历史上只有斯特拉斯堡的蠢举，而无阿尔柯拉的成功；只有布劳涅而无奥斯特利茨；他是法国血统，生下却是荷兰人，后来又入瑞士籍；他是个混杂着维胡埃尔的波拿巴；他之出名，仅在于他非常稚拙地摆出一副皇帝的架势。谁想从雄鹰身上拔一根羽毛，就有可能在手里拿着一根鹅毛。这波拿巴在军队里没有市场；他是一枚伪造的金币，与其说是金做的，不如说是铅制成。可以断言，法国士兵们对于付给他们的这枚假拿破仑金币，若要回报，决不会是用叛乱、暴行、屠杀、暗害和出卖。假如他试图干坏事，那是会流产的，没有一个团会挪动半步。何况他干吗要作这种尝试呢？他确实有一些不清不白的方面；但为什么要假定他是个罪恶滔天的家伙呢？这样极端的谋反是超越其人格的；他在实际上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又为什么要假定他在精神上能做到呢？他不是受到信誉的约束吗？他自己不是曾经说过：“欧洲没有任何人怀疑我的诺言吗？咱们不必担心。”对这番话可以这样回答：“犯罪的方式可以伟大也可以渺小；伟大者有如恺撒，渺小者不过曼德林。恺撒跨越鲁比恭河去同庞贝作战，曼德林跳过的却是小小阴沟。”这时贤哲们插嘴道：“咱们不要作污辱人的猜测，并因而做错事。这个人物被流放过，经历颇坎坷；流放可以明目，坎坷足以纠偏。”

至于路易·波拿巴，他却提出了强烈抗议。大量事实足以为他开脱。他为什么不说实话呢？他曾许下伟大的诺言。约在1848年10月底，他成为总统候选人之后，他跑到奥维涅圆塔街37号去见某人，并对他说：“我要向您澄清事实。有人污蔑我。难道我给您的印象是

个疯子？有人假定我想重新扮演拿破仑的角色！有两位人物是有雄心壮志者可以追随的楷模：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华盛顿。一位是天才人物，一位是有德之人。说自己将成为天才人物是荒谬的，说自己将成为有德之人则是正派的。有什么东西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依靠自己的意志能够做到什么？做天才人物？不可能。做诚实的人？那是可以的。具有天才并不是可以实现的目标，做诚实的人却可以实现。我又能再现拿破仑的什么呢？只有一点：就是犯下一桩罪行。这种雄心可就太美妙喽！为什么要把我设想成疯子呢？既然有共和国，那我就不是伟人，就不会抄袭拿破仑；但我是一个正派人，将会仿效华盛顿。我的名字‘波拿巴’将在法国历史上占有两页的位置：第一页上记载罪行和光荣，第二页上写着诚实和信誉。第二页可能与第一页不相上下。为什么？因为拿破仑更为伟大，而华盛顿却更为善良。在有罪的英雄或守法的公民这两者之间，我选择当守法的公民。这就是我的雄心壮志。”

从 1848 年到 1851 年，过去了整整三年。人们曾对路易·波拿巴长期抱怀疑态度；但久而久之，怀疑扰乱了智慧，并且由于徒然拖延而日益磨损。路易·波拿巴有一些双重人格的部长，像马涅和鲁埃尔；但他也有一些性格单纯的部长，如莱昂·伏舍和奥迪隆·巴罗；后面这两位断言路易·波拿巴是诚实和恳切的。有人在汉姆门前看见他捶胸顿足；他同母的妹妹霍尔滕斯·高尔努夫人写信给米埃罗斯拉夫斯基说，“我是个货真价实的共和派，我可以为他担保”；他在汉姆结交的朋友波热是个诚实的人，他说过，“路易·波拿巴是不可能出卖别人的”。路易·波拿巴不是写过那本论贫困的书吗？在爱丽舍宫亲近人物的圈子里，波托基伯爵是共和派，道尔赛伯爵则是自由派。路易·波拿巴对波托基说，“我是一个主张民主的人士”；对道尔赛则说，“我是一名拥护自由的党徒”。杜·哈莱侯爵是反政变的；侯爵夫人却支持政变。路易·波拿巴对侯爵说：“别担心。”（的确，他对侯爵夫人也说过：“您可以放心。”）国民议会曾经此一时彼一时地流露不安，但却缓过劲儿来，恢复了平静。那时有“完全可靠”的纽迈耶将军，他会从驻地里昂向巴黎进军。尚加涅埃大声喊道：“人民代表们，请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路易·波拿巴本人说过这样有名的话：“谁要是想以武力改变法律所建立起来的东西，我就视之为国家的敌人。”而且所谓武力，便是指军队；军队有其领袖，受到爱戴并且屡屡获胜的领袖，拉莫里西叶尔、尚加涅埃、卡芬那克、勒·弗洛、贝多、夏拉斯。难道能够想象非洲驻军逮捕非洲将军们？1851 年 11 月 28 日那个星期五，路易·波拿巴曾对路易·德·布尔日说：“即使我想干坏事也干不了呀。昨天是星期四，我请了巴黎驻军的五位上校共进晚餐，我灵机一动，便单独向他们每一位盘问了一番。五个人众口一词地告诉我：军队决不会帮助搞政变，决不会破坏国民议会的不可侵犯性。您可以把这话转告您的朋友们。”米歇尔·德·布尔日很放心地说：“他微微一笑，我也笑了。”在此之后，米歇尔·德·布尔日便在讲坛上宣布：“他是我的人。”在这同一个十一月份里，一家讽刺性报纸被控诬蔑共和国总统，因而判处罚款和监禁，所刊载的画面是路易·波拿巴以宪法为靶子进行射击。内政部长托里尼在内阁会议上曾当着总统的面宣布：任何被授予权力者都不得违背法律，否则就会成为……“一个坏人。”总统接着他的话说。所有这些言论和所有这些事实都是众所周知的。政变在物质和道义上都是不可能的，这已是有目共睹。危害国民议会！逮捕各位议员！这岂不是发疯！我们从前文已经看到：夏拉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保持警惕的，现在却放弃了一切戒备。安全感是全面而上下一致的。在国民议会里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才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有时摇摇头而已；但我们被人看做白痴。

巴黎在沉睡；门铃响了

1851 年 12 月 2 日，上索恩省代表维尔西尼——他住在巴黎莱昂尼街 4 号——正在睡

觉。他睡得很深沉。他夜间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工作。维尔西尼是一个三十二岁的年轻人。相貌温文尔雅，肤色略呈金黄，思想很开阔，倾向于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他把头半夜的时间用来研究巴斯蒂亚的一部著作，作了许多批注；然后，他将书打开在桌子上，自己却入睡了。蓦然间，他被一阵突发的门铃声惊醒，于是在床上坐起身来。时间已是晨光微熹的光景。不久便快到早晨七时了。

他猜不透一大早来访的缘由，便假定是有人弄错门牌号码。于是他又躺下，正要重温旧梦，却又听得第二声铃响，比第一声还更加意味深长，这回将他彻底唤醒。他穿着衬衫站起身来，跑过去开了门。

米歇尔·德·布尔日和特奥多尔·巴克走进门来。米歇尔·德·布尔日是维尔西尼的邻居，住在米兰街 16 号。

特奥多尔·巴克和米歇尔面色苍白，看上去非常激动。“

维尔西尼，”米歇尔说道，“赶快穿好衣服。人家刚刚逮捕了波纳。”

“嘿！”维尔西尼大声嚷着，“是不是摩甘事件再度触发？”

“比这更严重，”米歇尔又道，“半小时前，波纳的妻子和女儿上我家里来啦。她们让人家把我叫醒了。波纳是清晨六时在床上被捕的。”

“这意味着什么啊？”维尔西尼问。

门铃又响了。

维尔西尼去开了门。这回是皮埃尔·勒弗朗代表。他确实带来了谜底。

“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问。

“知道，”米歇尔回答，“波纳入狱啦。”

“是整个共和国被关进了囚笼，”皮埃尔·勒弗朗说，“你们看到了海报吗？”

“没有。”

皮埃尔·勒弗朗向他们解释说，现在墙上贴满了海报，好奇的人群纷纷挤上前去看个究竟。他本人挤到了街角一份海报的近处，明白政变已经发生。

“政变？”米歇尔叫喊道，“应该说是罪行！”皮埃尔·勒弗朗补充道：“一共有三张海报，一张是法令，另外两张是通告；所有三张都写在白纸上，并排张贴在墙上。”

法令的字体非常之大。

前立宪议员莱萨克像米歇尔·德·布尔日一样就住在附近（加亚尔城区 4 号），也突然光临。他带来了同样的消息，还说夜间另有一些人也被捕了。

不能浪费一分钟了。

他们赶紧去通知伊凡，他是由左翼任命的国民议会秘书，家住在德·布尔校街。

应当举行会议，应当立即通知并召集所有尚未被捕的共和派代表。维尔西尼说：“我去找维克多·雨果。”

那是上午八时，我已经醒来，正在床上工作。我的仆人走进来，以某种惊怖的神色对我说：

“有一位人民代表要跟先生说话。”

“谁呀？”“维尔西尼先生。”

“请他进来。”维尔西尼走进屋里，把那件事告诉了我。我从床上跳了下来。

他告诉我：聚会的地点在前立宪议员莱萨克家里。“

赶快去通知其他代表。”我对他说。

他同我分了手。

夜间所发生的事情

在 1848 年 6 月那些重大的日子之前，荣誉军人院前面的广场分成了八块开阔的滚球游戏草坪，这些草坪又用木栏杆围住，草坪外是两列浓密的树丛，中间被一条通向荣誉军人院大门的街道分开。那里又有宽广的草地，孩子们常到那儿嬉戏。八块滚球草坪的正当中是一个雕像座，在帝国时期置放着从威尼斯取来的圣 - 马克狮子像，复辟时期则供奉路易十八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在路易·菲利普时期则尊崇拉斐特的石膏半身像。1848 年 6 月 22 日，一个纵队的起义者几乎抵达立宪议会的宫殿，而周围又缺少兵营，于是卡芬那克将军便让人在立法宫的三百步外，也就是在荣誉军人院的草坪当间，修建了好几排长长的棚房，那下面的草坪也便荡然无存。这些棚房可以安顿三千至四千名士兵，专门接待保卫国民议会的卫队。

1851 年 12 月 1 日，在这广场上驻扎的军队是第六和第四十二战列团。第六团团长是加尔德朗斯·德·波依斯上校，该团在 12 月 2 日之前即声名远播；第四十二团团长是艾斯皮纳斯上校，该团在此日之后臭名远扬。

议会宫殿夜间的常规卫队包括一营步兵和三十名炮兵，由一名上尉指挥。国防部还另派了数名骑兵，担任传令兵。两门榴弹炮和六门大炮，外加它们的弹药车，排列在一处正方形的小院落里，位置在礼仪院的右侧，干脆被称为“大炮院”。营长即议会宫的军事长官，直接归议会事务主任领导。夜幕一降落，便有人关上大铁门和各处的门户，放好岗哨，传达了口令，于是这宫殿便像要塞一样与世隔绝。口令同巴黎要塞的口令一致。

由总务主任拟定的特令禁止任何武装力量入内，仅值班部队除外。在 12 月 1 日至 2 日夜間，立法机构的宫殿由第四十二团的一个营守卫。

12 月 1 日的会议开得很平静，内容是审议一项市政法，散会很晚，最后一项议程是上台投票。这时，总务主任之一的巴兹先生登上主席台准备往票箱里放票，一位属于所谓“爱丽舍宫”圈内的代表挨近了他，对他说：“今夜有人要把您抓走。”可以说天天都听到这类警告，结果是，如前面所说，谁也不再把这当回事。但在这次会议散会之后，几位总务主任将议会的专职警长叫了来。杜宾议长也在场。被询问的议长说，他手下警察们的报告是“一切平安无事”；这当然是他的用语，但那天夜里肯定是没什么需要担心的。当总务主任们还要追问时，杜宾议长说了声“得啦”，拔脚便走。

在同一个 12 月 1 日的白天，将近下午三时光景，正当勒弗洛的岳父在托尔多尼前面穿越大马路时，某人加快了步伐从他身旁擦过，对着他的耳朵喊了这样几个意味深长的字眼：“夜里十一点到午夜！”总务处里对此类消息已差不多是无动于衷了，甚至有少数几个人哈哈大笑，这已是老生常谈了嘛。然而，勒弗洛将军不愿在被提示的时间之前上床，便在总务处的办公室一直待到清晨一点。

国民议会的速记处外聘了四位信差，他们从属于《导报》，任务是将速记员的手稿送往印刷厂，再将校样带回国民议会宫，由希波里特·普莱服先生审阅修改。希波里特·普莱服先生是速记处处长，并以此资格而在立法机构的宫殿里拥有住宅。他同时还担任《导报》音乐专栏副刊的编辑。12 月 1 日，他到喜歌剧院去看了一场新戏的首演，直到午夜之后才回家。

《导报》的第四位信差正在等候他，手里拿着一份会议最新的长条校样；普莱服先生阅改了校样，那信使便被打发走了。那时是夜里一点钟稍过，四围是万籁俱寂；除警卫之外，宫殿里的各色人等都已沉入梦乡。就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件。国民议会卫队的上尉兼少校副官跑来找少校，并报告：“上校派人叫我去。”接着按照军阶的规定请示：“您准许我走一趟吗？”卫队司令官感到惊讶。“去吧，”他颇有些刻薄地回答，“但上校打扰一位正在值班的军官是没有道理的。”值班警卫的一名士兵没听见他们在说什么，仅听到司令官来回踱步，并且反复喃喃自语着：“鬼才知道上校要干什么。”

半小时后，少校的副手回来了。“好哇，”司令官开口问道，“上校要你干什么？”“没什么，”

那副手说，“他想向我面交明天值班的命令。”这时夜色变得更加深沉了。将近凌晨四点钟时，少校的副手再次来找少校，并道：“少校，上校叫我去。”“又叫你去！”少校感叹道，“这可真有点儿怪；不过还是去吧。”

少校副手的职责之一便是向卫兵们下达指令，因此也就有权力撤回这些指令。

少校副手一走开，少校便有些忐忑不安，琢磨着自己有责任同国民议会宫的军事长官联络。他上楼走进了长官——尼奥尔中校的房间。此时尼奥尔中校已经上床，工作人员也退回到各自在近处的房屋里。少校在这所宫殿里是初来乍到的新人，便只得在各条走廊里摸索前进；他对各处房间的情况知之甚少，便在自己觉得是军事长官住宅的门上按了门铃。没有人答理，门也没打开，于是少校只好回到楼下，竟不曾能够同任何人搭上一句腔。

少校副手则返回到国民议会宫，但少校却没有再见到他。少校副手停留在布良第广场格栅门的附近；他紧裹在军大衣里，在院子里来回走动，似乎在等候什么人。

当圆顶上的大钟敲响五点钟时，在荣誉军人院前棚屋兵营里的士兵们突然被叫醒了。小屋里低声传递着命令，叫大家不声不响地拿起武器。不久之后，有两团士兵背上背着军用背包，朝着国民议会宫进发；那就是第六团和第四十二团。

就在这五点钟敲响的同一时刻，巴黎各地区的步兵，同时跑出兵营，静悄悄地列队，由上校们率队准备出发。路易·波拿巴的副官和传令官们，早已被分派到所有的兵营，此刻正监督着拿起武器的进展情况。骑兵的启动比步兵晚了整整三刻钟，因为害怕踏在石子路上的嘚嘚马蹄声过早地惊醒酣睡中的巴黎。

德·帕尔西尼先生负责从爱丽舍宫将拿起武器的命令传达到了荣誉军人院的兵营，此刻正同艾斯皮纳斯上校并肩地走在第四十二团的最前头。军中流传着一个故事，因为在那一天，人民听说不光彩的事件已听腻了，所以还以某种悲观的语调转述着这类情节：那故事传说，正当要随同自己的团队一起出发时，一位应予隐姓埋名的上校犹豫不决了；于是，从爱丽舍宫来的那位使者打衣袋里掏出一只密封的信封，对团长说：“上校，我承认咱们正在冒很大的风险。我奉命将此信封面交给您，里面装着十万法郎纸币，供招募新兵之用。”团长接受了信封，团队出发了。12月2日晚上，团长对一位夫人说：“今天上午我赚了十万法郎，还弄到了将军肩章！”那夫人请他吃了闭门羹。

克沙维埃·杜里厄就是对咱们讲这故事的人；出于好奇，他后来去拜访了那位夫人。夫人确认了曾经有过这故事。不错，当然如此！她把这坏蛋拒之于大门外；他是一名出卖了军旗国旗的士兵、一名奸贼，竟敢来走访她！要她接待这么一个家伙？不！她不能这么干。据克沙维埃·杜里厄说，她还补充了一句：“虽然，我不存在有损名誉的问题！”

另一件神秘的事正在警察局展开。

老城区有一些惯于夜生活的居民，可能在夜间很晚时分才回家；他们也许注意到，有许多街头的出租马车三五成群、零零散散地在耶路撒冷街周围不同的地点走走停停。

从晚上十一时起，以热那亚和伦敦的难民到达巴黎为借口，保安大队的人员和八百名市区警察被留在了局内。凌晨三点钟，向巴黎和近郊区的四十八名警长以及治安官，下达了局长召见令。一小时之后，他们全部奉命来到。他们被推入一处单独的房间，并尽可能相互隔离开来。凌晨五点钟，局长办公室的一个铃铛鸣响了。局长莫帕斯将警长们一个挨着一个地叫进他的办公室，将计划透露给他们，并向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分配了他应完成的那一份罪行。其中没有一人拒绝，许多人则连声称谢。

要干的差事是在七十八位民主人士的家中一一逮捕他们，因为他们在本区具有影响力，而且爱丽舍宫害怕他们成为街垒里的头目。作为一种更加胆大妄为的侮辱，他们认为有必要在十六位人民代表各自的家中分别逮捕他们。最后这项任务被分配给了警长之中最有可能成为恶棍的那几个家伙。在他们之间对人民代表一一作了发落。每个警长都有自己的对象。古

尔提叶先生分到了夏拉斯；戴格朗吉先生分到了纳陀；老胡波先生分到了梯也尔先生；小胡波先生分到了贝多将军；尚加涅埃将军交给了勒拉；卡芬那克将军由柯林负责。杜尔朗斯先生得到了瓦朗丁代表；贝诺瓦先生得到米约特代表；阿拉尔先生分配到肖拉代表；巴尔莱特先生得到（北方省的）罗杰；拉莫里西叶尔将军落到勃朗舍警长手中；格隆费叶警长负责格列波代表；布德罗警长主管拉格朗吉代表。总务主任们也被作了与此相似的分配，即巴兹先生归普里莫林先生，勒弗洛将军归贝尔多里奥先生。

标明人民代表姓名的传票，在警察局长私人办公室里草拟停当。只有警长姓名一栏空着。这一栏要在出发时才临时填写。除已指定军队派人协助他们之外，还决定每位警长都由两队人马护送，一队是由市区警察组成，另一队则一律为便衣侦探。如同莫帕斯局长答应波拿巴先生的那样，共和国卫队上尉波迪奈将协同勒拉警长，前往逮捕尚加涅埃将军。将近五点半钟时，待命的出租马车被叫住，然后全部带着各自的指令出发。

与此同时，在巴黎的另一个角落——老寺院街，即在原先的苏比兹公馆，如今已早改作王家印刷厂的地方（现在的名称是“国家印刷厂”），罪行的另一部分正在被组织中。约在凌晨一点钟，一位过路人从老俄德里叶特街走到了老寺院街，发现在这两条街的交界处，有好几扇高高的长窗子被灯火照得通明透亮。那就是国家印刷厂车间的窗户。他向右边走去，进入老寺院街。稍过一会儿，他在印刷厂新月形的正门前停步。

大门已关闭，两名卫兵正守卫着旁门。透过这扇半开着的小门，他觑了一眼印刷厂的院落，发现那里面塞满大兵。大兵们默默无言，听不见一点儿声息，但却可以瞥见他们的刺刀闪烁着耀眼的寒光。过路人颇觉吃惊，便凑近去看。卫兵中的一名将他用尽力推开，同时大喊一声：“滚开！”就像警察局的城区警察被留下一样，国家印刷厂的工人也被以需要加夜班为由留下来。正当希波里特·普莱服先生返回立法机构宫殿时，国家印刷厂的经理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也是刚从喜歌剧院回来的。新剧本的作者是他的兄弟德·圣-乔治先生，他必须要去看看这出戏。这位经理刚一回来，便看到爱丽舍宫白天下达的命令，于是便抄起两把袖珍手枪，下楼走入了衣帽间。那衣帽间隔着几步阶梯与庭院相通。在通向街道的大门敞开之后，一辆马车驶入院内，一个拿着大文件包的男子下了车。经理走过去迎接他，对他说：“您是德·贝维尔先生吗？”“不错。”那人回答道。马车停稳，拉车的马被牵进了马厩，马车夫被关进了一间休息室。

在那里，人家给他端来饮料，并且将一只钱袋塞入他手中。那是用葡萄酒和金路易来做此类政策的支柱。马车夫喝了酒，然后便呼呼入睡。休息室的门被门上了。印刷厂庭院的大门刚关上，立刻又打开，放进来一些军人，他们闷声不响地往里走。接着大门又重新关上。这是机动宪兵队的一个连，即第一营第四连，由一位名叫拉罗什·德瓦西的上尉指挥。像后来人们可能注意到的那样，为执行所有微妙的任务，政变当局都有意只使用机动宪兵队和共和国卫队。这两支队伍几乎完全由原先的市政卫队队员组成，他们心中积蓄着二月里的怨愤。拉罗什·德瓦西上尉带来一封国防部长的信件，信里说：“他本人和他的队伍交由国家印刷厂经理调遣。”军人们一言不发地将子弹上了膛，在车间里安排了站岗放哨的人，同时在走廊里、各处门口和窗前，在所有的地方全都布了哨。在通向大街的门口也放了两个岗。上尉问，对他手下的大兵们应当下达什么指令，于是那乘坐马车来的男子回答道：“最简单明了啦：凡是试图出厂或欲穿行者，一律枪决！”

此人实际上是波拿巴先生的传令官德·贝维尔先生。他同经理一起退到二楼大办公室，那是俯视花园的一处单独的房间；他在那里向经理通报了他带来的东西——解散国民议会的法令、向军队的呼吁书、向人民的呼吁书、关于召集选举人的法令，另加莫帕斯局长的通告，以及他致警长的函件。前四件完全是总统手书。可以看出零零散散涂改的痕迹。工人们在等待。

他们二位每人由两名宪兵保护，决心不说一句话；然后在车间里散发了需印刷的文件。

这些文件被分割成一张张小纸条，好使任何一名工人都无法阅读一个完整的句子。厂长宣布给他们一个钟头时间以印好全部文件。然后各个片断都送到贝维尔上校那里，由他拼凑在一起并修改校样。

印刷的过程也同样谨慎小心，每台印刷机由两名士兵看守。无论怎样勤快，这项工作还是进行了两个小时。其间宪兵们监视着工人，贝维尔则监视着圣-乔治。这些事情结束之后，又做了一件可疑的事，它很像是叛卖中的叛卖。叛徒自有叛徒卖。这种类型的罪行是会出这类事故的。贝维尔和圣-乔治这两个心腹人物，手中掌握着政变的机密，也就是总统的脑袋；这个机密无论如何不应提前泄露，否则就会使一切都化为泡影。他俩灵机一动，要把这机密立即告诉二百个人，“以便观察反应”——此系后来升了官的贝维尔“前上校”的原话，此话当然有些天真。

他们将刚刚印出、墨迹未干的文件读给排列在院子里的宪兵们听。这些前市政卫队的队员报之以掌声。万一他们饬之以嘘声，天晓得这两位政变的“试验者”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来。也许波拿巴先生此时正在万森从美梦中初醒。人们放出了马车夫，给马车套上马匹；凌晨四时，那位传令官同印刷厂经理——从此已经是两名罪人——带着一捆捆法令来到警察局。自此，他们被打上耻辱的烙印。莫帕斯抓住了他俩的手。这正是国民议会宫被包围的时刻。在大学街，有一扇门是波旁宫的原有入口处，向着一条大道敞开，这条大道直通国民议会议长的宅邸。这扇门人称“议长门”，通常由一名卫兵守卫。一段时间里，少校副手，即夜间被艾斯皮纳斯上校两次召见的那位军官，站在那卫兵附近不声不响、一动也不动。五分钟之后，战列第四十二团走出荣誉军人院的兵营，其后稍有间距跟随行进的是第六团，该团从布良第街走过，又从大学街涌现。

一位见证人说：“该团行进有如人家在病房里蹑足而行。”它暗暗地来到“议长门”前面。此种埋伏是为了对法律搞突然袭击。卫兵见大兵们光临，便停住脚步；但正当他要大喊一声“什么人？”以示警告时，少校副手却缴了他的械；作为被授权撤回原有一切成命的军官，他命令卫兵让第四十二团自由通过，同时命令不胜惊奇的看门人打开大门。门枢转动了，士兵们在大马路上散开。佩尔西尼走了进去，并喃喃道：“事已办成！”

国民议会遭到了入侵。司令官麦尼埃听到脚步声跑了过来。艾斯皮纳斯上校对他大喊一声：“司令官，我是来为贵营换防的！”司令官一时脸色变得惨白，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地面。接着，他突然将双手放在上校肩上，猛然扯下他的肩章，拔出他的佩剑，用膝盖折成两半，扔到了石板路上。

他怒不可遏地颤抖着，用庄严的声音宣告：“上校！您污辱了贵团的番号！”“得啦，得啦！”艾斯皮纳斯道。“议长门”依然洞开着，但所有其他入口都照旧紧闭。所有的卫兵都被接替，所有的岗哨全换了人。值了夜班的全营人员都被打发回了荣誉军人院的兵营中，士兵们将手中的武器架在马路上和礼仪院内。第四十二团悄无声息地占下里里外外所有门户，占领了庭院、会客厅、长廊、通道、小径，而这时宫内的所有人员还在睡梦中。

不久之后，来了两辆小型轻便马车，人称“四十苏小车”，还有两辆出租马车，由两队共和国卫队和万森的轻装兵护送，另有几小队警察相随。贝尔多里奥警长和普里莫林警长从轻便马车上走了下来。当这些车马向前行驶时，有人看见一个秃了顶但却还年轻的人物，出现在布良第宫的门口。这人看上去很像老城区来的，似乎刚从歌剧院看了戏回来；实际上他确实是从那儿来。在这之前还去过赌场。他来自爱丽舍宫，名叫德·莫尔尼。他一度观望着士兵们将武器堆在一起，然后向“议长门”走去。

他在那里同德·佩尔西尼先生交谈了几句。一刻钟之后，他在万森的二百五十名轻装兵陪同下，一举拿下内政部，从床上把德·托里尼先生惊醒，颇为唐突地将波拿巴先生的一封感谢信交到他手中。就在几天之前，正直的德·托里尼先生（我们已引证过他那些充满智慧的见

解)对一批人发表谈话,而德·莫尔尼先生正从他们近侧走过;德·托里尼先生说:“山岳派的党徒们在诽谤总统!谁要是背叛自己的誓言、谁要是搞什么政变,那么谁就必定是个恶棍!”现在这位很有德行的人突然在半夜里被弄醒,其部长的职务被撤换,就像国民议会的卫兵被换防一样;他为之大吃一惊,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念念有词地自语:“哎呀!那么总统果真是一个……”“说对喽!”

莫尔尼接话道,同时仰天大笑。本书的作者认识莫尔尼。莫尔尼和瓦列夫斯基在那跟王室差不多的家族里,一个相当于王家私生子,另一个则无异于皇族的骨血。莫尔尼者何许人也?答曰:“颇有智术,工于心计,绝非苦行僧,罗米厄之友,基佐的支持者,风流倜傥,赌场常客,自鸣得意而聪敏机变,既有某些自由派思想,又不拒绝于己有益的罪恶;笑容可掬但牙口不洁;放荡不羁、挥金如土而又不失蕴藉;其貌不扬但和蔼可亲;热情奔放且衣着考究;大胆放肆,自愿让一个兄弟陷入囹圄,又准备为另一名当皇帝的兄弟肝脑涂地;与路易·波拿巴系同母所生,也像路易·波拿巴一样有生身之父或别有所出,因而可以自称为波哈尔内,或自称为弗拉霍,实际上却仍取名为莫尔尼;既从事文学又涉猎轻歌剧,既过问政治又串演悲剧;轻浮之至而不惜搞暗杀,既可充当马黎服笔下角色,又要成为塔西陀纵论之风云人物;不顾廉耻而高雅飘逸;声名狼藉而友善待人;必要时得以权充十足的公爵。

以上即为此一坏蛋之写照。”这时还不到清晨六时。部队开始在协和广场集结。

勒罗阿-圣-阿尔诺要在那里骑马阅兵。贝尔多里奥和普里莫林在总务处大楼梯的拱顶之下部署了两连人,但自己却不从那里通过。

他们的随从中对波旁宫了如指掌的警察,于是从某些走廊通过。勒弗洛将军住在德·波旁公爵时期德·斐谢尔先生住过的小楼里。这天夜里住在勒弗洛将军家里的还有他的姐姐和姐夫,他们是到巴黎来看望他的,所住宿的房间可以俯瞰宫里的一条走廊。贝尔多里奥警长敲了这扇门,设法让它打开,同手下的警察一起突然冲进了躺着一个女人的这间屋子。将军的姐夫从床上跳下,呼叫住在邻屋的总务主任:阿道尔夫,有人强行开门咧,宫里到处都是大兵,快起来哟!

将军睁开两眼,看见贝尔多里奥警长站在他的床前。

他一骨碌坐起了身子。

“将军,”那警长说,“我是来尽一项责任的。”

“我明白,”勒弗洛将军应道,“您已成了叛徒!”

警长嘀咕着“违反国家安全”之类的托词,拿出一张拘捕证来。将军不屑答理,用手背冲着这卑劣的证件劈打过去。然后他穿好衣服,穿上了他那君士坦丁和梅台阿时期的正式戎装,怀着正统军人的一种幻想,以为他所过之处见到的士兵还有非洲时期的将军在统率。哪知道只剩下了专搞害人陷阱的将军哟。他的妻子同他吻别;儿子才七岁,一边哭叫一边对警长求告,饶命呀,波拿巴先生!

将军紧紧将妻子搂在怀抱里,对着她的耳朵悄悄道:“院子里有炮弹,想办法叫人放一炮!”警长和警察将他带走。他蔑视这些家伙,根本不理他们;然而当他走进院子,看见那些大兵,当他认出艾斯皮纳斯上校时,他那颗军人的心、那颗布列塔尼人的心愤怒了。“艾斯皮纳斯上校,”他道,“你是个龌龊的家伙!我希望能长寿到看见扯下你军服纽扣的那一天!”原先的上校艾斯皮纳斯垂下脑袋,结结巴巴地说:“我不认识您呀。”一名营长晃动着佩剑叫喊道:“我们看够了那些律师味儿十足的将军!”有少数几个士兵对这位已被解除武装的“囚徒”交叉起刺刀来;三名市区警察将他推入一辆出租马车;一名少尉挨近了马车,直视着这个人物——作为公民,那可是他的代表;作为士兵,那也是他的将军啊。

而这少尉却对他发出这样不堪入耳的话语:“臭流氓!”

与此同时,普里莫林警长却绕了一个弯儿,以便更有把握地突袭另一位总务主任巴兹先生。巴兹先生的住宅有一扇门朝通向国民议会的一条走廊开着。普里莫林先生伸手去敲的便

是这扇门。“是谁呀？”一名女仆一边穿衣服一边问。“是警长。”普里莫林答道。女仆以为是国民议会的警长，便去开了门。

就在这时，巴兹先生听到嘈杂声而醒了过来，正在穿上晨衣，同时大喊：“别开门！”话音未落，一个着市民服装的人和三名着制服的市区警察冲进了房间。

那领头的掀开上衣，露出有红蓝白三色标志的腰带，问巴兹先生：“您认识这个吗？”

“你是个浑蛋！”总务主任回敬道。

警察们一把抓住了巴兹先生。

“你们不许把我带走！”巴兹先生喊道，“您是警长，是司法官员，了解自己的身份。你们正在侵犯国民代表权，正在侵犯法律，你们是罪犯！”

于是出现一场格斗，一场四比一的肉搏战。巴兹夫人和他们两个年幼的女儿大声叫嚷。那女仆被市区警察饱以老拳击退回去。

“你们是一伙强盗！”巴兹先生喊道。

他们抓住胳膊将他腾空抬起，他却拼命挣扎，光着身子，晨衣撕成了碎片，身上到处是肿块，手腕被抓破，鲜血流淌。

楼梯上，一楼楼道，庭院里，到处都是大兵，刺刀上了膛，持枪立正。

总务主任对着他们喊：“抓的是你们的代表！你们得到武器可不是为了犯法呀！”

有一位上士佩戴着新授予的十字章，他向这上士喊：“给你十字章难道是为了干这种事吗？”上士竟回答：“我们只知道一个主子！”

巴兹先生接着说：“我记住了你们团的番号。这个团从此蒙上了耻辱！”

大兵们不胜忧郁地听着这些训斥，似乎还浸沉在睡梦中。

普里莫林警长命令他们：“不要听他的！这同你们无关！”

他们将总务主任架过几道庭院，送到了黑门的看守队。

这“黑门”是人家给在拱顶下专辟的小门洞起的名字。门洞在议会财务处对面，门外正对着里尔街，出门便是布良第街。在看守队的门前布置了好几名哨兵，都站在通向北门的小台阶上。人家把巴兹先生交给三名市区警察看管。

几名穿军便服、不携带武器的士兵来回走动。总务主任凭着军人的荣誉招呼他们，但市区警察却对他们说：“不要理他！”巴兹先生的两个幼女怀着巨大的惊恐目送父亲远去；当她们看不见父亲的踪影时便号啕大哭起来。

“妹妹呀，”那只有七岁的姐姐说，“咱们祈祷吧！”

于是两个孩子合拢双手，扑通跪倒在地上。普里莫林警长率领一大帮警察冲进了总务主任办公室，他没收了一切。他首先看到桌面上放着几份文件，便立即拿过来，那是如果议会通过总务主任的建议便要颁发的法令草案。

所有的抽屉都被打开，并进行了搜查。这种为了掌握巴兹先生的文件而进行的翻箱倒柜式的查抄，警长称之为“家访”，前后持续一个多小时。人家给巴兹先生送来了衣服。当“家访”结束之后，便让他从看守队走出。院子里早已停好一辆出租马车，巴兹先生上了车，那三名市区警察自然相伴。马车为了驶向“议长门”，

先是经过礼仪院，然后经过炮队院，这时天已大白，巴兹先生打量着那第二进院落，看看大炮是否还在原地。他看见弹药车排列得井然有序，车轭却高高架起；那六门大炮和几尊榴弹炮的位置却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了。在议长大马路上，那出租马车暂停了片刻。两列士兵，个个用右臂撑着刺刀的小弯柄儿，沿大马路的人行道而立。

在一株树下围立着三条汉子：一是巴兹先生认识的艾斯皮纳斯上校，他一眼便将他认出；一是样子像中校的某个人物，脖子上系着一根橘黑二色的带子；再就是一名枪骑兵队长了。三人都手提大刀，相互默契地站立着。马车的车窗是关闭着的，巴兹先生想将它们打开以便招呼这几个人；但这时市区警察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这时普里莫林警长突然出现；他就要登上来时所用的二座小型马车了。“巴兹先生，”他很礼貌地招呼着——这礼貌是狱卒式的，政变的爪牙很愿意用它来掺和他们的罪行——“您受累啦，那三个家伙在马车里挤着您啦，过来同我坐一辆车吧！”

不料那俘虏却回敬：“别管我吧！我同这三个家伙在一起只是受累；若同您在一起，我可就变龌龊啦！”

出租马车两侧排列着押送的步兵行列。艾斯皮纳斯对马车夫叫喊道：“沿着道赛河滨大道走，用慢步，直至遇见骑兵押送人员；等骑兵负责陪送之后，步兵就退回了。”于是便出发。当出租马车在道赛滨河大道上转悠时，第十七枪骑兵团的一个小分队全速来到；这便是押送队了。骑兵围住马车，于是开始小跑前进。路上未发生任何事故。

只是不时有人听见马蹄得得的慢跑声，便打开窗户，有的人伸出脑袋；那俘虏也终于拉下一扇车窗，听见有人不胜惊骇地问：“发生了什么事呀？”

出租马车站住了。“咱们到哪里啦？”

巴兹先生问。“已经到了马扎斯。”

一名市区警察回答。那总务主任被带到法院的书记室。

他正往里走时，却赶上人家将波纳和纳陀带了出来。室内中央放着一张桌子，普里莫林警长乘坐小型马车尾随出租马车业已抵达，此时便来到桌旁坐下。正当警长忙于书写什么时，巴兹先生发现桌面上有一张纸，那显然是囚犯名单，依次写着以下各人的姓名：拉莫里西叶尔、夏拉斯、卡芬那克、尚加涅埃、勒弗洛、梯也尔、贝多、罗杰（北方省的）、香波尔。也许这就是人民代表被押送到监狱的顺序。当普里莫林先生手头的东西写完之后，巴兹先生对他说：“现在你得接受我的抗议，并将它列入你的正式记录。”警长却不同意：“这不是什么正式记录，这只是一份遣送令。”

巴兹先生驳斥道：“我要求立即书面记录我的抗议。”

“您关进狱室之后有的是时间。”一个站在桌子附近的男人微笑着说。

巴兹先生转过身来问：“您是什么人？”

那人应道：“我是本监狱的典狱长。”

巴兹先生又说：“若是这样，我就很可怜您啦。因为您深知自己正在犯什么罪！”

那人的面色变得惨白，支支吾吾说了几句含混不清的话。

警长站起身来；巴兹先生毫不客气地坐到他的软椅上，挨近了桌子，对那位普里莫林先生说：“您是公务人员，我要求您将我的抗议列入正式记录！”

那警长便道：“那么，好吧！”于是巴兹先生写下一则抗议，全文是：后文署名者为代表兼国民议会总务主任，全名为让-迪基埃·巴兹。本人被从在国民议会的住所强制绑架，旋被武力解送此牢狱。本人无法抵抗上述武力，兹以国民议会和我本人之名义，对我的同事及本人之国民代表权的侵犯提出严正抗议。

巴兹 1851 年 12 月 2 日清晨 8 时于马扎斯正当马扎斯经历此等情节之时，大兵们却在国民议会的院落里狂笑和畅饮。他们在饭锅里煮起咖啡来。在这之前，他们在院子里燃起一堆堆大火；在风力吹动下，火焰有时一直烧到会议厅的墙壁上。总务处的一位高级职员兼国民卫队军官拉克罗瓦泽特冒险提出忠告：“你们要放火烧着国民议会宫咧！”一个大兵当胸给了他一拳。从炮队院子里推出来的大炮中有四门架好了对准着国民议会；有两门放在布良第广场对准了铁栅门；还有两门置于协和桥上，对准的是大石阶。在这意味深长的故事的边缘，让我们提一件事情：这第四十二战列团就是在布劳涅曾经逮捕过路易·波拿巴的那个团队。1840 年，这个团曾经助法律一臂之力去反对谋叛者；1851 年，它却助谋叛者一臂之力去反对法律。“消极服从”这东西可谓妙不可言！

其他夜间行动

这天夜里，在巴黎各个地点都发生了强盗行径；一些陌生人率领着武装部队，而他们自己也带着各种各样的武器，有斧头、有铁锤、有钳子、有铁杠、有棍棒、有藏在衣服下的利剑、有从衣褶里可以窥出枪托的手枪；他们闷声不响地来到一家住房周围，包围了那条街道，切断四沿，撬开入口处，将看门人捆绑起来，侵入屋内的楼梯，不惜破门而入，冲向正在熟睡的某个人物。

当那被惊醒的人物质问这些匪徒：你们是什么人啊？为首的头目便回答：我是警长。这样的事发生在拉莫里西叶尔家，他被勃朗舍揪住了衣领。勃朗舍还威胁要塞住他的嘴巴；发生在格列波家中，他被格隆费叶殴打、掀翻在地，还有六个人充当帮凶，他们打着经过掩护的灯笼，手持一把板斧；发生在卡芬那克家中，他被柯林一把抓住，这柯林是一名善于甜言蜜语的大盗，对于听见卡芬那克“起誓赌咒”表示大为惊奇；发生在梯也尔先生家中，他被老胡波一把扭住，这老胡波还妄称目睹梯也尔“浑身颤抖、泪如雨下”，真是以弥天大谎充作滔天大罪的伙伴；发生在瓦朗丁家中，他在眠床上遭到杜朗朗的袭击，被从两肩到双脚整个儿抬进一部警车，那车还从外面上了挂锁；发生在米约家中，他遭到了非洲地堡里才会发生的酷刑；发生在北方省的罗杰家中，此公有勇有谋、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竟向强盗们敬献上一杯色列斯上等葡萄酒；夏拉斯和尚加涅埃横遭突然袭击，他俩都住在圣－奥诺雷郊区，几乎是门对门的近邻：尚加涅埃住在3号，夏拉斯住14号。

自9月9日以来，尚加涅埃辞退了那全副武装的十五个人，他们本来是被雇来守夜的，而在12月1日，正如我们在前文已提到的，夏拉斯从枪膛里退下了子弹。当人家上门搞突然袭击时，这些枪膛里空空如也的手枪还放在桌面上。警长纵身向这几把手枪扑了过去。“白痴！”

夏拉斯对他喊道，“假如子弹在膛上，那你早就毙命啦！”

咱们在这里提一个细节：这几把手枪是在攻克马斯喀拉时，由雷诺将军亲赠予夏拉斯的；而当政变当局逮捕夏拉斯的当儿，这位雷诺将军正骑着马在街上为政变效劳。万一这几把枪里依然上着子弹，而恰巧雷诺将军又奉命来逮捕夏拉斯，那么就会出现这等奇事：雷诺的手枪要了雷诺自己的命！在那样的情况下，夏拉斯当然不会有片刻犹豫。我们已经一一列举这批浑蛋警长的名字，但再提一遍也并非毫无必要：逮捕夏拉斯的是那个名叫古尔提叶的家伙；来抓尚加涅埃的是叫做勒拉的坏蛋；戴格朗吉带走了纳陀。这样被在家中逮捕的人物都是人民代表，他们是不可侵犯的。因此，在侵犯人身这个罪行之外，还要加上另一个枉法之举——破坏宪法。这违法行为中包含了种种无耻行径。警察们兴高采烈。有几个古怪的家伙还对别人冷嘲热讽。在马扎斯，警察团团围住梯也尔冷笑不止。纳陀毫不留情地斥责他们。小胡波先生叫醒了贝多将军。

“将军，您被捕了。”

“我是不可侵犯的。”

“彰明昭著的犯罪除外。”

“那么，”贝多驳道，“是犯了睡觉的大罪！”

人家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就把他拖上马车。在马扎斯彼此相遇时，纳陀同格列波握手，拉格朗吉也同拉莫里西叶尔握手。这竟会令警察们失笑。

一个名叫梯里昂的上校，脖子上挂着指挥官的十字架章，观看了将军们和人民代表的入狱。“请直视着我，我就是说您呢！”夏拉斯对他说。梯里昂悄然离去。这样，不算后来被捕的人士，在12月2日夜里共有十六名人民代表和七十八个一般公民被投入监狱。这桩罪行的两名代理人将上述情况向路易·波拿巴作了报告。

“实施监禁。”莫尔尼写道。

“叫他们坐班房！”莫帕斯这样写。

前者用的是沙龙熟语；后者说着监狱黑话。这只不过是用语上的细别。

罪行之晦暗

维尔西尼刚刚离我而去。在我匆匆穿上衣服的当儿，突然来了一个我百分之百信任的人物。这是一位可怜的高级细木工，人极善良，眼下无活可干；我在住处给他一间房屋让他居住，他在木器上精雕细刻，绝非文盲之辈。他刚从街上回家，浑身气得发抖。

“那么，”我张口便问，“一般民众怎么说？”

吉拉尔回答道：“很混乱咧。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大家都无法理解。工人们读着海报，一句话也不说，然后便去上工。一百个人当中只有一个开口说话。但也只是说：得啦！事情在他们眼中是这样的：5月31日的法律已被废除。‘也好。’普遍投票制业已恢复。‘那很好嘛。’反动的多数派被赶走啦。

“好极啦。”梯也尔被抓起来了。

“太棒啦。”尚加涅埃入了狱。

“真是顶呱呱！”在每张海报前都有拍手叫好的。拉达普瓦尔向老好人雅克解释这次政变。老好人雅克自愿上当。总之，我认为人民在参与呢。”

“是啊！”我说。“可是，”吉拉尔问我，“您将怎么办呢，维克多·雨果先生？”我从衣箱里取出了人民代表的横绶带，拿给吉拉尔看。他立刻明白了。我们俩握了握手。正当他走开时，卡里尼进来了。卡里尼上校是个有胆略的人。

在西西里起义中，他曾在米叶罗斯拉夫斯基手下指挥过骑兵。他曾写过几篇激动的、热情的笔记，叙述这次光荣的起义。卡里尼是热爱法国的意大利人士之一，就像咱们法国人也爱意大利一样。

所有心灵高尚的当代人都有两个故土：一是昔日的罗马，一是如今的巴黎。“谢天谢地呀，”卡里尼对我说，“您还是自由人呢。”他补充道：“这政变的搞法真可怕哟。国民议会包围了，我是从那里来的。革命广场、各条河滨大道、推勒里宫、大马路都充塞着部队。士兵们背上背着包。炮兵阵地上架了炮。若要打起来，那是很可怕的。”我回答他：“会打起来的。”我笑着又道：“您曾经证实上校能像诗人们那样写作，那么现在该轮到诗人像上校们那样战斗了！”我走进妻子的房间；她还一无所知，正躺在床上静悄悄地读着报纸。

我随身带了五百金法郎，又在妻子的床上放了一只靴子，里面装了九百法郎，也就是我的全部积蓄。然后，我对她说了正在发生的事。

她脸色变了，问我：“你去干什么呀？”

“去尽我的责任。”她同我吻别，只说了两个字：“尽吧！”

我的午餐已端上来，我三口两口吞下一份牛排。我就要用完餐时，女儿进来了。看我同她那拥抱的方式，她也激动起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啊？”“你母亲会向你解释的。”我对她说。于是我走啦。奥维涅圆塔街平静而荒寂，跟平常一样。不过，在我的家门口有四个工人在交谈，他们跟我打了招呼。

我对他们大喊道：“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知道。”四人一齐答。

好呀！要明白这是叛卖！路易·波拿巴扼杀了共和国。人民受到了攻击，人民应当自卫。”

“人民会自卫的。”

“请你们答应这样做啊！”他们大声说：“我们答应！”其中有一个还说：“我们向您起誓！”他们是说话算话的。在我居住的这条街上筑起了街垒（就是说，在奥维涅圆塔街上）；筑街垒的还有烈士街、罗迪埃城区、柯克纳尔街以及洛雷特圣母街。

海报

同这些勇士分手之后，我在奥维涅圆塔街同烈士街相交的街口上，读到了夜间在全巴黎墙上到处张贴的那三份卑鄙的海报。全文如下：

共和国总统通告

致人民的呼吁书

法国人民！现在的局面已不能继续维持。每过一天，国家的危险就加剧一天。国民议会本应是秩序最坚实的支柱，却变成了阴谋的温床。三百名议会成员的爱国主义并未能制止这种可悲的趋势。国民议会不是从全局利益出发未制定法律，而是在制造武器准备打内战。它在侵犯我直接得自人民的权力；它在鼓励所有恶劣的欲望；它在损坏法兰西的宁静；我已解散国民议会，让人民在议会同我之间作出裁决。你们都清楚：宪法的规定，事先即以削弱你们将赋予我的权力为目标。

六百万张选票是对宪法掷地有声的强烈抗议，然而我仍然忠实地遵守它。我对挑衅、污蔑、污辱一概无动于衷。但如今，不断引证基本大法的人却不再尊重这法律；已经毁灭过两个王朝的那些人还想束缚住我的手脚，以便来推翻这个共和国。在这样的时候，我有责任挫败他们阴险的计谋、维护本共和国、拯救这个国家，并为此而依靠我在法国所承认的唯一主人，即人民来作出庄严的判决。

因此，我诚实地向全国呼吁，并通告你们：如果你们愿意继续这种令人不安的状态——它正在使你们失去尊严并损害我们的未来——就请你们选择别人来取代我，因为我不想再要这种无力行善的权力，它正在让我对自己不能阻止的行动承担责任；它继续将我捆绑在船舱上，而我正目睹这大船急驶而去，行将落入深渊。如果适与此相反，你们仍然信任我，那么就请你们给我以手段，来完成我受你们嘱托应当完成的伟大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终结一再发生革命的这个时期，同时满足人民的合法需要、保护他们以反对颠覆性的狂热。这个使命尤其是要建立比人更为稳定的体制、奠定若干基础，以便在此基础上确立某种恒久的东西。我确信：政权的不稳定性、仅有国民议会拥有至高无上地位，乃是混乱与不和的经常性的原因。

因此，我请你们赞同以下的宪法主要基本内容，此一宪法可在以后由各级议会予以发展：

1. 应有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元首，任期为十年；
2. 应有仅仅从属于执行机构的若干部长；
3. 由最杰出的人物组成国务会议，该会议责任起草各项法案，并提交立法机构予以审议；
4. 成立审议并通过各项法律之立法机构，该立法机构应经普选产生，而不得来自伪造选举结果的“按名单选举”；
5. 由全国所有贤达人士组成第二议会，构成平衡权力，保障根本大法以及公众自由。

这一体制是由首席执政在本世纪初缔造的，它业已给法国带来安宁与繁荣；它还将能为法国保障安宁与繁荣。

以上就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如果你们同意，就请通过选票充分表明。如果恰恰相反，你们更愿意要一个软弱的政府——不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而这种体制是抄袭自我不知其出处的历史，或抄袭自虚幻的未来，那么就请你们作否定的回答。

由此可知，你们将自 1804 年以来首次在心明眼亮的情况下投票，也就是说：你们将完

全明白是为了赞成谁、赞成什么东西而投票。

如果我不能得到你们的多数选票，那么我就将促成举行新一届国民议会的会议，并将会把得自于你们的授权交还给它。

然而，假如你们认为：以我的姓氏为象征的事业，也就是 1789 年大革命所复兴的法兰西、由拿破仑皇帝组织妥善的法兰西，仍然是你们的事业，就请你们大声宣布这一点，办法是批准我要求你们赐予我的权力。

那么，法国和欧洲就能从无政府状态中获得拯救，障碍就会被夷平，相互间的敌对就会消失，因为所有的人都将按照伟大人民的裁定，而对上帝的旨意谨奉不违。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1851 年 12 月 2 日，签署于爱丽舍宫

共和国总统向军队发布的通告

士兵们！你们应当为自己的使命而感到自豪；你们将拯救祖国，因为我指望着你们，不是为了违背法律，而是为了使国家的第一大法——国家主权——得到尊重，我正是这一主权的合法代表。很久以来，你们同我一样遭遇到障碍：这些障碍既阻挠我想从事的善举，又妨害你们表达对我的支持。这些障碍现已打破。国民议会企图损害整个国家授予我的权威，它现已不复存在。我向人民、向军队发出诚实的呼吁，并且向他们通告：或者请给予我手段以保证你们的繁荣，或者就另请高明，取我而代之。

1830 年和 1848 年，人家都把你们当做战败者。人家先是挫伤了你们英勇无私的精神，接着便对你们不屑一顾，无视你们的同情和意志，而你们却正是民族的精华。今天，当此庄严时刻，我切望军队发出响亮的声音。那么作为公民，就请你们自由地投下一票；但是作为士兵，请牢牢记住，对当政首脑的命令绝对地服从军队——从将军到士兵，都必须严格遵守的责任。我对人民、对未来的千秋万代，就自己的行动负责；鉴此，我理应采取我觉得为公共利益所必须之各项措施。至于你们，请你们继续坚定不移地恪守纪律、维护荣誉。请以你们严正的态度，来帮助举国上下在平静和思考中表示自己的意志。请作好一切准备，在出现任何妨碍人民自由行使主权的尝试时严惩不贷。士兵们，我不必向你们提及我的姓氏引起的往事回顾。它们镌刻在各位的心坎上。我们是以难解难分的纽带联结在一起的。你们的历史同我的历史不可分割。你们同我在历史上是荣辱与共、甘苦同当的。至于在未来，我们将会有共同的感情与决心，以维护法兰西的安宁与雄伟。

路—拿·波拿巴（签字）

以法国人民的名义共和国总统指令：

第一条

国民议会得予以解散。

第二条

普选制⁽²⁾得予以恢复。5 月 31 日的法律得予以废除之。

第三条

自本年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21 日，法国人民被召集举行公民会议。

第四条

在第一军区管辖范围内实施戒严。

第五条

国务会议应予解散。

第六条

内政部长负责执行本法令。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1851 年 12 月 2 日于爱丽舍宫

内政部长
德·莫尔尼（副署）

布朗西街 70 号

盖雅尔城区是很难发现的。这个新区有一条小巷，将烈士街和布朗西街划分开来。我还是找到了这条街。我先来到 4 号门牌，伊凡便从走马车的旁门出来，并且对我说：“我是在

这儿先告诉您一声的；警察已在监视这所房屋；米歇尔在布朗西街 70 号等候您，离这儿只有几步路。

“我认识布朗西街 70 号。那里住着马宁，即那位令人难忘的威尼斯共和国总统。何况，大家也并不是要在他的家里聚会。70 号的女看门人让我上了二楼。门打开了，一位四十来岁的女人，还挺漂亮，头发已有一些花白，把我带进一间客厅；她就是柯本斯男爵夫人，我已认出了她，因为在社交活动以及我自己家中都曾有过一面之缘。在那儿的已有米歇尔·德·布尔日和亚历山大·雷伊；后者是前立宪议员、雄辩的作家和一个好人。亚历山大·雷伊当时负责编辑《国民报》。大家互相握手寒暄。

米歇尔问我：“雨果，您想怎么办？”

我回答：“作一切努力。”

“我也是这个意见。”他道。

好几位人民代表都来了，特别要提到的有皮埃尔·勒弗朗、拉布鲁斯、特奥多尔·巴克、诺埃尔·巴尔法、阿尔诺·德·拉里埃奇、德摩斯泰纳·奥里维埃（他也是前立宪议员）和夏拉莫尔。愤怒是深沉的、难以表述的，但大家没有说无益的话。大家都怀着一腔悲壮的愤慨，而伟大的决心往往来自此种愤慨。人们在交谈。人们在介绍形势。每个人都分头带来最新消息。特奥多尔·巴克来自利昂·伏舍家，伏舍就住在布朗西街。是巴克叫醒了伏舍，把政变的消息告诉了他。利昂·伏舍的第一句回答便是：“多么卑劣的行为！”夏拉莫尔从最初时刻起，便表现出大勇，而在整整四天的斗争中，此种勇气时时刻刻都很充沛。

夏拉莫尔身材高大、表情坚毅、言辞恳切：他同左翼投一样的票，但坐席却在右翼席上。在议会中他的邻座是蒙达朗贝尔和里扬赛。他有时同他们发生激烈争论，我们远远看到，觉得挺有趣儿。夏拉莫尔前来参加 70 号的聚会，穿着某种军用厚呢上衣，是蓝色的呢料，身上带着武器，像后来我们发现的那样。

罪行的赞同。要力戒出现那种被称为“既成事实”的态势。拿起武器来！有好几位议员强烈支持上述意见，特别是埃加·基内、佩尔蒂埃和杜特尔特。米歇尔·德·布尔日有重大的异议。我的本能要求立即开始行动。他的意见却是要等待，静观其变。照他的见解，催促结局的到来是极其危险的。政变是很有组织的，而人民却没有组织。我们是被突然袭击的。不应该抱有幻想，群众还没有动起来。郊区是一片平静。

感到惊奇——确实如此；义愤填膺——并非如此。巴黎的人民是十分聪明的，但却还没有弄明白。米歇尔补充道：“现在不是 1830 年。查理十世赶走了二百二十一人，便得冒二百二十一人重新当选的风险，因此挨上一记耳光。我们不处于此种局面中。当年的二百二十一人深得民众爱戴，而现在的议会并非如此。一个遭到侮辱并被解散的议会，但却得到人民支持，那就一定会胜利。

因此，人民在 1830 年奋起斗争。今天的人民是死水一潭。他们正在上当受骗，接着便会成为牺牲品。”米歇尔·德·布尔日的结论是：得给人民留下理解、愤怒和奋起的时间。至于我们这些代表，如果匆忙行事、加剧形势，就未免是胆大妄为。立即直接同部队对峙，这便是送上门去挨枪子儿，纯属白白牺牲。也等于事先把争取法治的人民起义的天然领袖，即人民代表剥夺掉此一机会。

这就是剪除人民军队的领袖。而等待时机却是良策。要防止过多地进行操练，应当保存实力；暴露自己就等于未战先败。

比如，就不应去参加右翼提出的、中午举行的大会，凡是参加的人都会被抓走。应当保持自由的地位，应当岿然不动、保持平静，同时也有所行动，等待人民投向我们。只要四天的鼓动，而并不进行战斗，即可使军队疲惫不堪。

米歇尔也主张毕竟要动起来，但仅限于张贴宪法第六十八条。不过，到哪里去找印刷厂呢？米歇尔·德·布尔日言谈之中具有对革命方法的经验，而这正是我所欠缺的。他多年以来

与群众有交往。他的意见富于智慧。还应补充一点：我们得到的所有情报都对他有利，并且似乎结论都是与我相悖的。巴黎很沉寂。政变当局的军队非常平静地侵入城内，甚至没有人扯下海报。几乎所有在场的人民代表，包括最勇敢的人士，无不赞同米歇尔的见解：等一等，瞧瞧看。有人说：明天夜间将会开始有骚动。

人们作出了同米歇尔·德·布尔日相同的结论：应当给人民以理解的时间。行动过早就会冒孤立无援的风险。在这事发的初期，我们是动员不了人民的。应当让愤怒的情绪逐渐激发他们的心灵。如果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表示就会流产。这是所有人共同的感觉。我本人听了他们的议论，也觉得自己发生了动摇。也许他们说得有道理。

白白地发出战斗的信号将会是犯下错误。如果不打雷，光制造闪电又有什么用处呢？提高嗓门儿、发出呐喊、找到一家印刷厂，这是首要的问题。但是否还存在着自由的新闻呢？勇敢的老兵、原第六军团团长弗莱斯蒂尔上校走了进来。

他把米歇尔·德·布尔日和我叫到一边。“请听我说，”

他向我们请求，“我是找你们来的，我被免了职，不再指挥我那个军团，但我请你们以左翼的名义，任命我为第六军团的上校。请为我签发一道命令，我便立即到任，叫人击鼓集合。只要过一个钟头，第六军团便可待命出发。”

“上校，”我立即应道，“比签署一道命令更好的事，我也愿意做：我将陪同您赴任！”

我便转身向夏拉莫尔，他在楼下备有车马。“跟我们一起走吧。”我对他说。弗莱斯蒂尔掌握两位可靠的营长。我们一致同意立即驱车到这两人的家中；米歇尔和其他各位代表将在彭瓦莱家里等候我们，地址是寺院大道土耳其咖啡馆附近。在那里，大伙儿再作斟酌。

我们于是出发了。我们穿越过巴黎，那里已经出现一些具有威胁性的动荡。大道上挤满忧虑的人群。人们熙熙攘攘，彼此交谈而并不相识，这便是群众性惶恐的重大标志。三三两两的人，在街角处大声叫喊着。店铺正在把大门关上。“干起来吧！”夏拉莫尔叫道。从一大早起，他就在城里游荡，非常担忧地注意到群众无动于衷。我们在弗莱斯蒂尔上校认为可指望的两位营长家中找到了其人。

接待我们的是两位穿细麻衣服的富商，举止态度有些尴尬。商店的店员们聚集在玻璃橱窗面前，目送我们路过。那只不过是一种好奇心罢了。不过两位营长当中的一位，取消了他当天要作的旅行，并答应给我们协助。“但请不要有幻想，”他又道，“人们估计会受到侧面攻击。不会有很多人参加游行。”

弗莱斯蒂尔对我们说：“瓦特兰，第六军团的现职上校对政变之类并无兴趣；他也许会友好地将指挥权转交给我。我将单独一个人去拜访他，以免过分惊动人家。然后我到彭瓦莱家跟你们会合。”在圣－马丁门斜坡上，我们下了车。夏拉莫尔同我沿着大道步行，以便就近看到人群，更好地观察群众的表情。公路工程最近平了地，使圣－马丁门大道变成一道深沟，两侧是峭壁。峭壁高处是有护栏的人行道。

车马在深沟里行驶，而行人则在便道上走路。正当我们抵达大道的时分，一队步兵纵列拉长队伍，正在通过这道深沟，队伍前头是击鼓手们。明晃晃的刺刀波浪式地起伏，显得很浓密，挤满了圣－马丁方形广场，直到远处的好消息大道深处才无影无踪。密集众多的人群挤满圣－马丁大道，其中有许多身着工装的工人，倚着人行道的栏杆伫立。

当纵队的队首在圣－马丁门剧场前面进入这条“深沟”时，众口一词迸发出一声高呼：“共和国万岁！”

士兵们继续不声不响地向前行进，但可以说他们的步伐正在放慢；有几名士兵以犹豫不决的眼光看着人群。

这“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欢呼呢，还是喝倒彩？在这一时刻，我的感觉是共和国抬起了额头、政变当局垂下了脑袋。同时夏拉莫尔对我说：“人家认出您来啦！”的确，到水塔的水平线上时，人群将我团团围住了。

几名年轻人喊道：“维克多·雨果万岁！”

其中一个问我：“公民维克多·雨果，该怎么办呢？”

我回答：“撕掉叛徒的海报，那是政变者的宣传；高呼‘宪法万岁’！”

“要是人家朝您开枪呢？”一位年轻工人问我。

“你们就去拿起武器！”

“好呀！”人群大声喝彩。

我又道：“路易·波拿巴是个叛逆。他如今已负上了千种万种罪名。我们人民代表宣布他是不法分子；但仅仅由于他叛卖的这一事实，就不需要我们来宣布，他即已是一名不法分子。公民们，你们有双手；请一只手高举法律，另一只手拿起枪，朝着波拿巴冲去！”“好呀，太好啦！”

人民反复欢呼。一位正在关店门的市民提醒我：“请声音小点儿。要是他们听见您有这等言论，准会杀了您！”

“好呀！”我又道，“那就请你们抬着我的尸体游行！假如从我的死能产生出青天正义，那这牺牲便是一件好事！”

所有的人都高呼：“维克多·雨果万岁！”

我回答道：“请呼喊：‘宪法万岁！’”

于是从所有胸膛都迸发出震天动地的呼叫：“宪法万岁！共和国万岁！”

热情、愤怒、气愤熔成一道道电光，闪耀在所有人目光中。当时我认为，现在仍然认为：这也许是崇高的一秒一分。我受到诱惑，真想率领这批群众立即开始战斗！夏拉莫尔示意我克制。他对我耳语道：“您将造成不必要的机枪扫射。大家全都没有武器。步兵近在咫尺。后面还有炮兵呢。”我转过头来瞧瞧。

确实，有好几尊大炮，由炮车拉着，颇为迅疾地由水塔后的邦迪街冒了出来。夏拉莫尔关于我不要鲁莽的劝告，给我以深刻印象。这种规劝来自这样一位人物、这样一位勇士，自无可疑之处。而且，我感到还受着约束，因为方才布朗西街会议是作了决定的。我对自己承担的责任感到望而却步。

抓住这样一个时机，或许会是胜利，或许竟是一场屠杀。我那时说得对吗？我是否弄错了？人群在我们四周聚集起来，所以很难再往前走。但我们还是想赴彭瓦莱的约会。突然有人推了推我的胳膊，原来是《国民报》的利奥波尔·杜拉斯。“别再往前走啦。彭瓦莱餐馆已被包围。米歇尔·德·布尔日试图对人民发表讲话，但部队已经开了过来。他只是很勉强地从那里走了出来。人家逮捕了好几位来找他的代表。往回撤吧。咱们回到布朗西街原先约会的地点。我找您就是为了通知此事。”

一辆轻型马车驶过；夏拉莫尔向车夫做了个手势。于是我们跳上了车，尾随在后的人群高呼：

“共和国万岁！”

“维克多·雨果万岁！”

似乎就在此时来了一支市区警察小分队，以便将我抓走。车夫策马飞奔。一刻钟之后，我们到达布朗西街。

侵犯会场

清晨七时，协和大桥上还没有行人；国民议会的大铁栅门仍然关闭着；透过铁格子可以看见一级级的石阶。1848年5月4日，这个石阶上挤满了士兵，宣告了共和国的成立；那时，在高高圆柱后面的平台上，可以看见一束束枪支。

而在立宪议会时期，即在5月15日和6月24日之后，遮掩着山区用的小口径榴弹炮，里面填充了炮弹并且指向前方。

一位戴着红假领的看门人，穿着国民议会的号服，站在大铁门下通过步行者的小旁门。不时有一些代表来到。

看门人问：“这些先生是代表吗？”

接着便将门打开。

有时他问问他们的姓名。大家顺利地来到了杜宾先生的住所。在大走廊、餐厅、议长礼仪厅等处所，可以看到穿号服的仆役，正在像平常那样悄悄打开各处的大门。

天亮之前，在巴兹和勒弗洛这两位总务主任被捕后，就剩下了德·帕纳先生这唯一的总务主任了，他因为是正统派而得到宽容，或者遭到蔑视；就是这位德·帕纳先生跑来叫醒了杜宾先生，并请他立即召集留在家中的各位代表。杜宾先生竟作了一个闻所未闻的荒唐回答：“我看不出有什么迫切性。”几乎与德·帕纳先生同时，吉罗姆·波拿巴代表跑了过来。他以命令的口气要求杜宾先生主持国民议会。

杜宾先生却回答说：“我办不到。我出不了门。”吉罗姆·波拿巴哈哈大笑起来。的确，人家甚至不屑于在杜宾先生的家门前安排一个岗哨。大家都知道，他是因为生性低劣而出不了门。只是到更晚一些时候，大约在正午时分，人家才怜悯他。人家也感到过于蔑视他了，于是同意给他派两名卫兵。七点半钟时，十五至二十名议员，特别是欧仁·苏、约雷、德·雷塞基埃和德·塔尔胡埃，已经聚集在杜宾先生的客厅里。

他们也徒劳无益地对杜宾先生作了努力。在靠近一扇窗户的地方，多数派的一位风雅的议员，有点儿耳聋的德姆梭·德·吉夫雷先生，怒不可遏地同他的一位右翼伙伴几乎争吵起来：他误以为此人是赞成政变的。杜宾先生一人远离一群群代表，穿着黑色衣服，双手放在背后，低垂着脑袋，在房间前面来回踱着步。

屋内已点燃旺盛的炉火。人家大声地、在他家里并且当着他的面议论他，他却似乎什么也没听见。两位左翼议员来了。

一位是罗纳省的贝诺瓦先生，一位是克莱斯丹先生。克莱斯丹先生走进客厅，径直走向杜宾先生，对他说：

“议长先生，您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吗？国民议会为什么还没有召开呢？”

杜宾先生停住脚步，用他习惯的拱一拱脊背的动作来回答：“没有办法啊！”然后他又重新散起步来。

“这就够啦。”德·雷塞基埃先生说。

“这太多啦！”欧仁·苏说。

所有的代表都走了出去。然而协和大桥上已到处是部队。瓦斯特—维麦将军干瘦、苍老、矮小，剪得平平的白头发紧贴着两鬓，身着正式的戎装，头戴翻沿军帽，扛着他那两块大肩章，在大庭广众下展示着他的绶带：那不是人民代表的绶带，而是现役将军的绶带，那绶带因过长而拖在地上；将军则徒步在桥上奔走，为了帝国和政变的需要而向士兵们发出得意扬扬但却口齿不清的命令。

在1814年时，我们已经领教过这种形象。不过，他们那时佩戴的不是三色标志，而是一种巨大的白色标志。在最远处，也是同样的现象。一些老者高呼：“过去的日子万岁！”几乎就在同时，德·拉罗什雅克兰先生穿越过协和广场，他身边环绕着一百多名穿工装的男人，那些人带着好奇的表情，不声不响地跟随他向前走。好几个团的骑兵，依次排列在开阔的香榭丽舍大街上。

八点钟时，大批兵士包围了立法机构的宫殿。所有的通道都部署了警戒，宫殿的所有大门一律关闭。不过还是几位代表设法钻入了国民议会宫，不是像有人误传的那样，似乎是通过荣誉军人院广场一侧议长公馆的小道，而是通过布良第街的小门，即所谓“黑门”。这扇

门，不知是出于什么疏忽，还是什么诡计，一直敞开到 12 月 2 日中午时分。但布良第街上已到处是部队。东零西散也有一些小队分布在大学街上，他们让稀稀落落的行人照常通过。从布良第街那扇门溜进来的代表们，一直深入到会议厅里，在那里遇见从杜宾先生家里走出来的同事们。

不久，在这大厅里已渐渐集中了国民议会各派别的人物，其中有欧仁·苏、里夏代、法约尔、约雷、马克·杜弗莱斯、罗纳省的贝诺瓦、卡内、甘朋、达代尔斯瓦德、克莱比、雷佩兰、台雅尔—拉台里斯、朗蒂昂等各位先生；有莱代将军；有波林·杜里厄、夏内依、布里利埃、吉隆特省的柯拉、莫奈、加尔农、法夫罗以及阿尔贝·德·雷赛基埃等各位先生。

每个新来者都去询问德·帕纳先生。“副议长们到哪里去啦？”

“进监狱啦。”

“另外那两位总务主任呢？”

“也进监狱啦。我请你们相信，各位先生，”德·帕纳先生补充道，“人家不逮捕我是对我的一种侮辱；但我本人对这种状态并未起过作用。”

愤慨已经达到顶峰；在蔑视和生气的感情里，交融着各种各样千差万别的喜怒哀乐。德·雷赛基埃先生坚决的程度并不亚于欧仁·苏先生。国民议会似乎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的同心同德，如此的声气相投。每个人都在说出他自己对爱丽舍宫那位人物的看法；而且人们发现，很久以来，路易·波拿巴自己已在国民议会创造了一种一致，即一致蔑视这个家伙；但大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状况。吉隆特省的柯拉先生做出种种手势，并且滔滔不绝地讲述。他来自内政部，见过德·莫尔尼先生。他同这位先生谈过话。

他，柯拉先生，对波拿巴先生的罪行义愤填膺。但自此以后，这罪行却把他变成了国务会议议员。德·帕纳先生在各个小组间来回穿梭，向代表们宣布他将于下午一时召集会议。但不可能等到那个时候。时间越来越紧迫。在波旁宫就像在布朗西街一样，大家普遍感觉到：正在消逝的每个小时都在成全着政变；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沉默或无所行动的分量，正像一种悔恨、懊恼，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铁的包围圈正在紧缩，士兵的潮流不断涌来，并且悄悄地侵入这座宫殿；每一分秒间都可以发现，片刻之前还能够通行的一扇门前又加了一名卫兵。不过在会议厅集中的这一群代表还受到尊重。必须行动起来，必须大声疾呼，必须立即开会展开斗争，不能再浪费一分钟。甘朋说：“再试试找杜宾吧；他是咱们的正式负责人呀；我们需要他咧。”于是有人去找他。但是却找不着。他人已不在这里；他失踪啦，不见了，躲起来了，藏到了洞里，蜷缩起来，埋入土中，消失了，埋葬了。

藏到哪里去了呢？谁也不知道。怯弱也有“三窟”，“窟”洞何在？无人知晓。突然有一人走进会议厅，是一名穿军装、与议会毫不相干的男子。他肩佩高级军官的肩章，腰挂一把宝刀。这是第四十二团的一位营长，前来勒令代表们走出自己的工作地点。所有的人，不论是保皇派还是共和派都向他拥去（这是一位愤怒的目击者所用的说法）。

莱代将军对他说了一番不是送入他的耳膜，而是掷向他脸颊的话语。“我干我的活儿，我执行上级的命令。”

那位军官支支吾吾地说。“如果您认为您是在干您的活计，那么您就是白痴！”

莱代对他大喊大叫起来，“而如果您明知是在犯下一桩罪行，那您就是一个浑蛋！您听见我的话了吗？您要是有胆量，就当场发火呀！”那军官不肯“当场发火”，只是重申道：“那么，先生们，你们不愿退出啦？”

“不。”“我就去寻找武力啦。”

“请便。”他退出去了；实际上是向内政部寻求指示去了。代表们等待着，那气氛是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可以把这种气氛称为“法律在暴力面前的窒息”。

不久，刚才退出的他们当中之一人，又匆匆忙忙走进会场，并警告代表们说：有两连机

动宪兵手持步枪来到了国民议会宫。马克·杜弗莱斯大声喊叫着：“让这次谋叛干得完全、彻底！让政变到我们的议席上来寻找我们！”他还进一步点明：“既然我们都在这儿，就演一场实实在在、活灵活现的雾月十八日的活报剧吧！”

他们一起走进了会议室。通道是畅行无阻的。卡西米尔—佩里埃会议厅还没有被开入的部队占领。他们总计是六十人左右。有好几位佩上了人民代表的横绶带，他们带着某种默哀的神色走进会议厅。在那里，德·雷赛基埃先生出于好意，为了形成一个更密集的人群，坚持要求大家都坐到右侧去。

“不行，”马克·杜弗莱斯说，“每人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于是大家分散到会议厅的各处，都在自己平常的席位上落座。莫奈先生坐在中左派的低排席位上，手里拿着一本宪法。过去了好几分钟，没有一个人发言。这是那种等待式的沉默，预示着决定性的行动和最终的危机将要来临；在这类沉默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好像在听取自己良心的最后指示。突然，机动宪兵队的士兵们由一位提着明晃晃的马刀的上尉，出现在门槛上。会议厅遭到侵犯，代表们从所有坐席上同时起立，高呼：“共和国万岁！”然后他们又重新坐下。

莫奈代表一人仍然站立着，以宏亮而愤慨的声音命令士兵们在原地止步。那声音如号角一般在开阔的会议厅里吹响。士兵们停止了前进，带着怔怔的表情，注视着代表们。士兵们只是阻塞了左面的走廊，并未横穿主席台。这时莫奈代表大声诵读了宪法第三十六、三十七条和第六十八条。第三十六和三十七条规定代表们是不可侵犯的。第六十八条规定在议长背叛祖国时可予撤职。这一时刻是庄严的。

士兵们默默无声地聆听着。读完这些条文后，达代尔斯瓦德代表——他坐在左翼低排议席的第一个位置，离士兵们最近——转身向士兵们，并对他们说：“士兵们，你们已看到：共和国总统是一个叛贼，并且也要把你们变成叛贼。你们侵犯了国民代表神圣的会场。我们以宪法的名义、法律的名义，命令你们立即退出会场。”正当达代尔斯瓦德代表讲话时，指挥机动宪兵们的营长走了进来，宣布道：“先生们，我奉命请你们退场，如不退场将把你们驱逐出去。”

“奉命将我们驱逐！”达代尔斯瓦德喊道；接着所有的代表都跟着喊：“谁的命令？让我们看看那份命令！谁签署的命令？”司令官取出一张纸，将它展开。他刚一展开，紧接着就做了个动作将它重新放进衣袋；但莱代将军已向他扑过去，抓住了他的胳膊。好几位代表弯身向前，于是有人念了关于议会的驱逐令。签署人海军部部长富尔图尔。

马克·杜弗莱斯转向机动宪兵，对他们大喊道：“士兵们！你们待在这个地方本身就是犯了重罪。快退出去！”士兵们似乎犹豫不决。但突然又有第二个纵队自右侧门出现。在司令官的一个手势下，上尉嚷道：“向前齐步走！把他妈的……这些家伙统统赶出去！”这时开始了不知当如何言状的、宪兵同立法者间的搏斗。士兵们手持步枪，侵入上议员的坐席当中。雷佩兰、夏内依、兰提安被粗暴地从坐席上拉走。两名宪兵冲向马克·杜弗莱斯，两名冲向甘朋。他们长时间地在右翼的第一个坐席上挣扎着，那也就是奥迪龙·巴罗和阿巴杜契等先生平常坐的位置。

波林·杜里厄以武力抵抗暴力；得三条汉子才能把他从座位上拉开。莫奈被按倒在警长的马车长凳上。他们一把抓住达代尔斯瓦德的脖子，把他扔出了会议厅。里夏代身患残疾，也被打翻并受到虐待。有几个人已被刺刀尖刺到一点儿皮肉；几乎所有人的衣服都已被扯破。司令官对着士兵们叫喊：“扫荡！”

就这样，六十位人民代表被政变当局扭住脖子，并被赶出了坐席。打砸抢的行动使贩卖达到了顶峰。物质的行动与精神的举止旗鼓相当。最后出会议厅的三位是法约尔、台雅尔—拉台里斯和波林·杜里厄。人家让他们从国民议会宫的大门出去，到达布良第广场。布良第广场已经被加德朗斯上校指挥的第四十二战列团占领。在国民议会宫和占据广场中心的共和国女神像之间，有一尊大炮直指国民议会的正门。在那尊大炮的旁边，万森的轻装兵正在给他

们的武器填充弹药，拉开了子弹带。加德朗斯上校在一组士兵附近骑着马，而这批士兵引起了台雅尔—拉台里斯、法约尔和波林·杜里厄等代表的注意。

在这群士兵当间，三个被捕者奋力挣扎着，高呼：“宪法万岁！共和国万岁！”法约尔、波林·杜里厄和台雅尔—拉台里斯挨近了一看，这三名被捕者原来是多数派的三名成员：杜佩—代—维涅、拉杜—拉弗斯和阿尔拜。阿尔拜代表大声呼叫着。当他提高嗓门儿时，加德朗斯上校以这样的用词打断他，而这几个词是值得在此留下一笔的：“闭上你的臭嘴！再多说一句，老子要你好看！”

左翼的三位代表怒不可遏，喝令上校释放他们的同事。“上校，”法约尔道，“您这是三倍地违法！”“我还要六倍地违法呢！”上校回话道。说着，便叫人逮捕了法约尔、波林·杜里厄和台雅尔—拉台里斯。士兵们奉命把他们带到正在兴建中的外交部宫里的哨所。这六名“囚徒”在两行刺刀押解下一边前进，一边遇见了三名同事，即欧仁·苏、夏尔内和罗纳省的贝诺瓦等代表。欧仁·苏挡住了军官的去路，那军官便是小分队的指挥官。欧仁·苏对他说：“我勒令你释放我们的同事！”

“我办不到。”那军官回答。

“要是这样，你就犯罪犯到底吧！”欧仁·苏说，“我们勒令你也逮捕我们！”

军官逮捕了他们。人家把他们带到了外交部大楼工地的哨所。后来又从那里带到了道赛滨河路的兵营。其实是到夜里才由两个战列连来接应，把他们带到了这最后的归宿。那负责指挥的军官一方面叫士兵们来押解他们，一方面行九十度鞠躬礼，很客气地对他们说：“先生们，我手下士兵的武器可是子弹上了膛的！”像我们前面说的，撤出大厅是在一片吵闹声中进行的，士兵们推着人民代表，通过各条通道撤退。有些代表（包括我们提到的那几位）是从布良第街出去的；有的是经过漫步厅，被拖向协和桥对面的铁栅门(3)。漫步厅的外厅是一个通道厅，那里有通往高讲坛的楼梯，还有大走廊里的玻璃大门，直接通到议长的宅邸。

到达通道厅之后，只见旁边是一个小小圆亭，那里是国民议会厅一个出口的旁门；士兵们就在那里让代表们自由活动。顷刻间，在那里形成一群人，卡内和法夫罗两位代表发表了讲话。一个喊声突然出现：去找杜宾！有必要的話，让咱们把他拖到这里来！有人打开玻璃门，冲进大走廊。这一回，杜宾先生在家里。杜宾先生听说宪兵们已叫人从大厅撤出，于是便从躲藏的地方走了出来。

议会既已被压倒，杜宾先生却站立起来。法律被囚禁，这个人物却觉得自己解放了。卡内和法夫罗先生率领的人群发现杜宾正待在办公室里。在那里开始了一场对话。代表们坚决要求议长带领他们回到会议厅里，因为他是议会的体现，而他们却是全国人民的体现。杜宾先生坚决予以拒绝，坚决顶住，毫不动摇，英雄般的紧紧抓住他的虚无态度不放。

“你们究竟要我干什么？”他问，将许多法学上的格言和拉丁引言掺和在他的抗议中，就像那些絮絮叨叨的小鸟，当它们害怕时便拿出整套整套的废话来应付局面。“你们究竟要我干什么呢？我算什么呢？我又能干什么呢？我什么也不是呀。谁也不再是什么要人了。到处是虚无，虚无。武力已经来到。凡在有武力的地方，人民就丧失权利。那里就建立一种新秩序。请你们自己拿定主意。至于我，我不得不逆来顺受。‘法律无情，但须依法。’咱们应当取得共识：法律是根据必要，法律不是根据权利。可怎么办呢？请别再烦我吧。我不能做什么；我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并不缺少良好的愿望。如果我手下有四个兵加一名上士，我就命令他们去杀人。”

“这个家伙只认武力，”代表们说，“既然如此，就让咱们使用武力吧。”

于是大家便迫使他就范，将一条横绶带像一根绳子似的套在他的脖子上。就像事先说过的那样，把他拖进了会议厅。而他却挣扎着，呼吁还他“自由”，哼唧着，抵抗着——我要说：像马驹子似的反抗着，当然这个用词实在是不雅。在撤出大厅之后几分钟，这同一个漫步大厅，方才出现过代表们被宪兵扭走的场面，现在却轮到杜宾先生被代表们抓获！大家没能

走多远。士兵们挡住了左右两扇绿色大门。艾斯皮纳斯上校跑了过来，宪兵指挥官跑了过来。大家看见：在司令官的衣袋里，掠过了两支手枪的圆形枪柄。

上校的脸色苍白，司令官的脸色苍白，杜宾先生的脸色铁青。双方都很害怕。杜宾先生害怕上校；上校呢，当然并不害怕杜宾先生。但在这张可笑复可怜的面孔后面，他却眼见出现了峥嵘怪物：就是自己正在犯的罪行！于是他颤抖了。在荷马的名著中，就有复仇女神在忒尔赛特身后出现的场面。(4)杜宾先生有几分钟时间显得惊愕、呆痴和闷声不响。

甘朋代表对着他大喝一声：“杜宾先生，说话呀！左翼并没有打断您呀！”

于是，这倒霉的家伙心灵在代表们言辞的冲击下，胸膛又在士兵们的刺刀直逼下，开口说起话来。此时此刻从他口里说出的话语，在这庄严的一分钟里，这位法兰西的全权议会议长在宪兵们面前吞吞吐吐说的话，是不能予以记载的。听见这懦夫在垂死时作噎作呕之声的人们，都忙着要净一净自己的耳朵。他似乎磕磕巴巴地说了这样的意思：“你们代表武力，你们手里端着刺刀；我引证的是法律，我悄然离去。我谨荣幸地向你们致敬。”

于是他果然离去。人家让他离去。在出门的当儿，他转过身来，吐出了几句话。我们不收集这种言论。历史是不准备废纸篓的。

比死更坏的结局

我们想到此为止，永远不再提到这拥有“法兰西国民议会议长”伟大称号达三年之久的家伙。实际上，他只会充当多数派的仆从。他在一生最后的时期，居然还想出了办法，使自己堕落到更低贱的境地，这境地是人们难以设想的，即使放在他身上也是如此。他在议会的生涯是仆从的生涯，他的结局则是走狗的结局。杜宾先生在宪兵面前闻所未闻的那种态度，特别是伪装抗议的样子，令人不得不怀疑。

甘朋大声说：“他那抵抗的样子倒像一名同谋犯。他早就全部知情。”

我们认为此类怀疑是不公正的。杜宾先生一无所知。在政变操纵者之中，有谁愿找这个麻烦来确保他支持呢？收买杜宾先生！这怎么可能呢？而且，这又有何用呢？给他一笔钱？干吗要这样做呢？既然恐惧已经够用的了，那岂不是白白浪费金钱吗？有某些勾结本来就是现成的。胆怯乃是奸诈的老伙计。法律流淌的鲜血很快就被拂拭了。在手持利剑的刺客之后，便来了送上海绵的胆小鬼。

杜宾逃到了他的办公室里。人家尾随他而来。

“天哪，”他叫喊起来，“你们竟不明白，我想独自一人安静点儿！”

的确，从上午以来，人家无异在给他上酷刑，想从他身上榨出点儿勇气来，但实际上却根本不可能。“你们对我的虐待比宪兵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抱怨道。代表们在他的办公室坐定，坐在他的桌旁。只见他坐在软椅里呻吟不已，一边叽里咕噜地低声抱怨。他们动笔起草一项关于不久前发生之事的记录，想在档案中留下叛逆行为的正式痕迹。记录写成后，卡内代表予以宣读，让议长听清，并递给他一支笔。

“你们要我拿这干什么呢？”他问。

“你是议长啊，”卡内回答道，“这是咱们的最后一场会议了。你的责任便是签署这份记录。”这个家伙竟然拒绝了。

黑门

杜宾先生其人便是莫大的耻辱。不久之后，他领起薪俸来了。他好像担任了上诉法庭的什么检察长之类。杜宾先生给路易·波拿巴帮了忙，做了在他的位置上最卑劣的人。让我们继续讲这个凄惨的故事。右翼代表们在对政变惊魂未定之际，大批拥入了达鲁先生的寓所。达

鲁先生是国民议会的副议长，同时也是“金字塔”派会议的召集人之一。

这一会议一贯支持爱丽舍宫的政策，却并不相信政变是预谋的。达鲁先生住在里尔街 75 号。将近上午十点钟时，约有一百余名代表聚集在达鲁先生家中。他们决心试图溜进国民议会的会议厅。里尔街直达布良第街，差不多正对着通往波旁宫的小门：我们在前文已说过，这小门被人称做“黑门”。

在达鲁先生率领下，他们朝这扇门前进。他们手挽着手，三人一组、三人一组地行进着。有几位戴上了横绶带。后来他们又解下来。“黑门”像往常一样半开半闭，现在也只有两名岗哨守卫着它。最愤怒的几位，特别是德·凯尔德雷尔先生，冲向这小门，企图跨入门内。但这时门却被猛力重新关上，于是在代表们与赶来的市区警察间发生了某种格斗，其间一位代表的手腕被扭伤。

同时，一队在布良第广场排列整齐的战列营开始移动，以跑步速度向着这一群代表前进。达鲁先生非常高雅，但也非常坚定，向司令官示意停步；那一营人停止前进；于是达鲁先生以宪法的名义，并且以他国民议会副议长的资格，勒令士兵们放下武器，让代表人民主权的议员们通过。那个营的指挥官以下达命令的方式来回应，要他手下的人立即清理这条街，并且声称国民议会已经不复存在。

他说，至于他本人，他不知道何谓人民代表；如果在他面前的这些人不自愿撤退，他将动用武力把他们驱逐。

“不是在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我们决不让步！”达鲁先生说。

“你们正在犯下重罪！”凯尔德雷尔先生说。

那军官下令冲锋。各连队以密集队形前进。一时出现了混乱。几乎是迎头相撞。被以猛力推回的代表们退向里尔街。有几位跌倒在地上，还有几位右翼议员被大兵们在烂泥中拖走。他们当中的一位，即艾蒂安先生，肩膀上挨了一枪托。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补充一句：八天后，同一位艾蒂安先生变成了“咨询委员会”这个劳什子的委员。他觉得政变是件好事，大概他挨的那一枪托也甚好！于是大家回到达鲁先生家中；一路上，被驱散的这一群重新聚在一起，甚至还新加进来好几个人。

“先生们，”达鲁先生说道，“咱们缺少一位议长，会议厅也被关闭了。我是副议长，我的家也就是国民议会宫啦！”

他打开了一大间客厅，右翼的代表们在那里安顿下来。在那里，先是吵吵闹闹地争论了一番，后来达鲁先生指出，时间极其宝贵，于是恢复了安静。需要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废除共和国总统，即实施宪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有几位代表由我取名，因而被称做右翼“指挥官”的，在一张圆桌旁坐下，着手起草废黜文告。正当他们即将宣读文告稿时，一名从外面走进来的代表出现在客厅门口，告诉聚会的人们：里尔街上已到处都是军人，随时将会包围这座公馆。不能再浪费一分钟了。贝诺瓦·达齐先生说：“先生们，咱们到第十区区政府去，可以在那里进行讨论，有第十军团可以保护咱们：劳里斯顿将军这位老同事是那个军团的上校啊。”

达鲁先生公馆后园有一条小路，在花园深处有一扇小门。许多代表从那里逃了出去。达鲁先生准备紧跟他们而去。当门打开时，客厅里仅仅剩下了他本人，以及奥迪龙·巴罗和另外两三个人。一名上尉走了进来，并对达鲁先生说：“伯爵先生，您已是我的俘虏。”

“我应当跟您上哪儿去？”达鲁先生问。

“我奉命把您软禁在您自己家中。”

确实。他的公馆已处于军事占领之下；就是这样，达鲁先生被阻止出席在第十区区政府举行的会议。那军官让奥迪龙·巴罗先生走了出去。

高等法院

正当这些事情在左岸发生的时候，人们注意到在正午时分，司法宫漫步大厅里有一个人正在踱着方步。这个人身着短大衣，纽扣扣得整整齐齐。远处似乎有几个支持者暗中陪伴着他。某些警察行动有一些配角儿，他们那种两面派的面孔令过路人惴惴不安，以至人们自问：这是些执法人员呢，还是一伙盗贼？

那扣紧短大衣纽扣的家伙从一扇门走向另一扇门，从一处走廊来到另一处走廊，同那些紧跟着他的打手交换着暗号，然后又回到大厅。半路上他常常拦住碰见的律师、诉讼代理人、守门人、书记员、大厅服务员，向所有的人低声提出同样的问题（为的是不让行人听见），对这个问题有作肯定答复，也有作否定答复的。于是那人又重新在司法宫里踱步，那外貌活像一个搜寻什么东西的密探。那人便是军械库的警长。他在寻找什么呢？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在干什么呢？它躲藏了起来。为什么要躲起来？为了进行审判吗？既是，也不是。

上午，军械库的警长接到莫帕斯局长发来的命令，叫他在高等法院自认为必须开会的任何地点，查明它的踪迹。这位警长将高等法院同国务会议混为一谈，起先到了道赛河滨大道。他在那里一无所得，甚至也没有找到国务会议，便两手空空地回来，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情去找司法宫。既然他是要找管司法的，也许在那里可以找到。因为不曾找到，所以他便离去。但高等法院毕竟举行了会议。在哪里举行，又怎样举行的呢？让咱们看一看吧：我们所写这段历史所处的时刻，也就是在当前的修复巴黎古老建筑的工程之前，当人们绕过哈尔莱庭院进入司法宫时，有一条不甚雄伟的阶梯曲曲折折地把您带向一处叫做麦尔西埃尔长廊的通道。在这条通道的中途，可以看见两扇门：一扇在右，通向上诉法庭；一扇在左，通向最高法院。左边的门有两扇，开向一条古老的长廊，即圣－路易长廊。那长廊是不久前修复的，如今给最高法院的律师们充作漫步厅。

一尊圣－路易的木质雕像正对着入口的正门。这尊雕像右侧横切的一堵墙上开了一个出口，通向一处旋转的通道；通道尽端是某种死胡同，由两扇双重的门掩饰着。右边的门上写明“首席院长办公室”；左边的门上写着“审判庭”。在这两扇门当间，为了让律师们可以走向民事庭的大厅（那是过去议会的主要会议厅），人家开辟了一条又狭又黑的羊肠小道。按照某位律师的说法，在那里可以无法无天地犯下任何可怕的罪行。如果抛开首席院长办公室不管，同时打开写着“审判庭”字样的那扇门，便可穿越一大间屋子，中间有一张很大的马蹄形的桌子，四周安放着许多绿色的椅子。

这间屋子在 1793 年做过陪审法官的议事厅，是革命法庭的一部分；在屋子深处，木板隔墙上挖出一个门框，通往一个过道，那里又有两扇门，右面是刑事庭庭长办公室，左面则是酒吧间的门。

“判处死刑！咱们这就去吃晚饭！”这两件事几百年来都是联结在一起的。

还有第三扇门，在这条过道的终端。这扇门可以说是司法宫的最后扇门，是最偏远、最鲜为人知、最无人问津的一扇门，它开向所谓最高法院的图书馆，那是丁字尺形状的一间大厅，有两扇窗户向着裁判所监狱的大院。这间大厅陈列着几张皮椅子、一张铺着绿毯的大桌子，以及从天花板直落地面的书架，上面放满了法学方面的书籍。可以看出：这间大厅是司法宫中最偏远、最隐秘的一间屋子。

正是在这间屋子里，12 月 2 日上午约十一时，进来了几位穿黑色服装、未着法官大袍的人物，没有标识，惊恐万状，不知所措，连连摇头，窃窃私语着。这些战战兢兢的人物，也就是所谓高等法院了。根据宪法，高等法院由七位法官组成：一位院长、四位审判官和两位候补审判官，他们由最高法院在其成员中遴选，每年改选一次。

在 1851 年 12 月，这七位最高法官的姓名是：哈杜因、帕塔叶、莫罗、达拉帕尔姆、柯齐、格朗台和盖诺；最后这两位是候补审判官。这些人几乎是默默无闻的，其此前的经历也颇值商榷。柯齐先生几年前是巴黎王家法院的庭长，是一个性情温和而很容易惊慌失措的人。他是那位学士院院士兼数学家的兄弟，那位数学家发现了声波算法；他的另一位兄弟是贵

族院的前书记官兼档案官。

达拉帕尔姆先生当过总起诉律师，同复辟时期的新闻官司颇多牵连；帕塔叶先生在七月王朝时充当过中间派议员；塞纳省的莫罗先生的特色是人家干脆称他为“塞纳人”，以区别于缪尔特省的莫罗先生；缪尔特省的莫罗先生的特色是人家干脆称他为“缪尔特人”，以区别于塞纳省的莫罗先生。第一候补审判官格朗台先生曾经担任巴黎的庭长。

我读到过对他的这样的赞语：“他既没有魄力，也没有任何见解。”第二候补审判官盖诺先生是自由派、议员、官员、总起诉律师、保守分子，学识渊博，听官方的话，一步登天就当上了最高法院刑事庭庭长，并在刑事庭表现为最严厉的人物之一。

1848年冲击了他关于法学的观念；他在2月24日之后辞去了职务；但在12月2日之后却不肯辞职。哈杜因先生是高等法院院长，从前当过刑事法庭庭长，他是个宗教人物，是严格的詹森派，在同事之间被称为“细心的法官”，居住在波尔·罗亚尔，经常阅读尼柯尔的著作，属于巴黎马莱区老式议员那种类型，到司法院来上班是骑着骡子；骡子当然已经过时，但去过哈杜因家中的人，在他头脑里发现的犟脾气比在骡厩里还更多。12月2日上午九时，有两个人走上了孔戴街10号，并在他的门前相遇。一位是帕塔叶先生；另一位是最高法院律师团最受尊敬的一员，来自斯特拉斯堡的前立宪议员马丁。帕塔叶先生前来听候哈杜因先生调遣。斯特拉斯堡的马丁在读了指变的海报之后，一心想到的便是高等法院。哈杜因先生让帕塔叶先生来到他办公室隔壁的一间屋子里，把他当做心腹，在没有见证人的情况下予以接待。马丁坚决要求召集高等法院会议，请大家让他“自行其便”；宣布高等法院将“恪尽己责”，但首先他必须“与同事们会商”；最后宣称“不是今天，便是明天，会办到的”。“今天、明天！”斯特拉斯堡的马丁大声叫嚷，“院长先生，能不能拯救共和国、能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或许将取决于高等法院行动或不行动。

您的责任实属重大，请牢记毋忘。您既然是高等法院的人，就不是今天或明天尽责任的问题，而是立刻行动，马上就干，不浪费一分钟，不犹豫一瞬间。”斯特拉斯堡的马丁说得对，正义总是应当立即实施。

斯特拉斯堡的马丁补充道：“如果您需要一个人来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我愿意主动献身。”

哈杜因先生婉拒了这个提议，确认他不会浪费一分一秒，但请斯特拉斯堡的马丁让他哈杜因与同事帕塔叶先生“会商”一下。

的确，他决定在十一点钟召集高等法院聚会。大家同意在图书馆大厅碰头。法官总是很守时的。十一点一刻，他们全部到齐。帕塔叶先生最后一个到会。他们在大绿桌旁开起会来。